

伦理、情感和历史的关系：论《天使在美国》中的非自然叙事

The Interplay of Ethics, Emotion and History: Unnatural Narrative in *Angels in America*

郑 杰 (Zheng Jie)

内容摘要：无论是历史背景设置、人物设定还是戏剧主题，美国当代剧作家托尼·库什纳的戏剧《天使在美国》似乎延续了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直面美国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疫情的爆发这一社会问题以及在同性恋团体内部乃至整个社会所引发的相关伦理、政治、宗教问题。然而，戏剧的现实主义题材和形式上“非自然叙事”的交织无疑向读者/观众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反模拟(antimimetic)的戏剧叙事结构促使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在后现代语境中，作家如何探索超乎当前认知限度的“伦理身份”和“伦理情感”？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在重新定义的伦理关系中确立道德价值体系和情感关系？笔者认为，通过戏剧中不可能场景的设置，库什纳在探讨伦理身份和情感问题时，最终指向的是伦理和历史的关系，即从伦理的角度来解释历史。普莱尔和鬼魂艾塞尔在非自然叙事中伦理身份的转换和伦理情感的认知，使他们从被历史控制和压抑的客体变成了主动改变历史轨迹的主体。

关键词：非自然叙事；伦理身份；伦理情感；认知；《天使在美国》

作者简介：郑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戏剧和文学理论。

Title: The Interplay of Ethics, Emotion and History: Unnatural Narrative in *Angels in America*

Abstract: Set in 1986 at the height of the AIDS epidemic, the disintegration of communism, and the unraveling of Reaganism, *Angels in America* by Tony Kushner is a play that raises moral questions. It is a play that asks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our responsibility to others, about the meaning of human progress and about the links between ethics and history. The article aims to demonstrate how the notions of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emotion are reconfigured in the “unnatural narrative,” and furthermore, to explore how this reinterpretation shape our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of reality and history.

Key words: unnatural narrative;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emotion; cognition

Author: Zheng Ji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heatre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zhengjie1997@hotmail.com

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的《天使在美国：关于国家主题的同性恋幻想曲》（1993）是一部长达七小时，分为上下两部的戏剧史诗，自上演以来就成为20世纪晚期最受关注的美国戏剧作品之一。^①戏剧设置在1986年的纽约，艾滋病在美国开始恣意流行，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逐渐拖垮社会主义的前苏联和东欧阵营，也使里根政府岌岌可危。戏剧探讨了同性恋者之间的情感纠葛、传统宗教与现代信仰的冲突、不同种族间的误解与歧视、政治上保守主义与假民主的自由主义之斗争等庞杂而晦涩主题。作为一部公认的后现代史诗剧，无论是历史背景设置、人物设定还是戏剧主题，《天使在美国》似乎延续了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直面美国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疫情的爆发这一社会问题以及在同性恋团体内部乃至整个社会引发的相关伦理、政治、宗教问题。然而，戏剧的现实主义主题和形式上“非自然叙事”（unnatural narrative）^②的交织无疑向读者/观众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参照扬·阿尔贝（Jan Alber）关于“非自然叙事”（unnatural narrative）内涵的释义，非自然叙事指的是“物理上、逻辑上和人类属性上不可能的场景”（25）。剧中人物和鬼魂的相遇、在天堂里和天使们的斗争等情节挑战了我们对于理性现实世界的理解，借用丽莎·祖希尼（Lisa Zunshine）对于非自然叙事的理解，“暗示性地违背了某种重要的概念性‘边界’”（19）。《天使在美国》中反模拟（antimimetic）戏剧叙事结构促使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在后现代语境中，作家如何探索超乎当前认知限度的“伦理身份”^③和“伦理情感”^④？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在重新定义的伦理关系中确立道德价值体系和情感关系？具体到这部戏剧中，库什纳如何理解伦理、情感和历史之间的互动联系？

《天使在美国》的故事情节围绕着两个艾滋病患者展开。曼哈顿的普莱尔对同性恋男友路易讲述了自己的艾滋病情。病痛和孤单折磨着普莱尔，路易无能为力，他们的关系也日益疏远。与此同时，臭名昭著的律师科恩也身染艾滋病，而科恩的被保护人乔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后离开了妻子。上部《千禧年降临》展示的正是在艾滋病的侵袭下，曾经亲密的人际关系被摧毁，世界走向新世纪时社会文明的日益瓦解和混乱。戏剧最后以天使从天而降告终。下部《重建》借助故事讨论了历史发展的两种可能性：终结或复兴。因为上帝已经出走，天使邀请普莱尔担任死亡先知。科恩最终死在医院的病床上，死前却得到了众人的谅解。故事的结局颇有乌托邦的意味：在纽约公园的毕士达喷泉边，^⑤剧中不同身份的人（黑人、犹太人、摩门教徒和同性恋者）

重聚于此，对生活充满希望，于是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诞生了。

毫无疑问，在上世纪末关注个人和群体历史有着特别深远的意味。这是因为，正如上部剧名《千禧年降临》所影射，随着新世纪的临近，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戏剧文学弥漫着关于全球和美国文化的末世论情绪。另一方面，关于“审判日”的主题从古至今都被赋予悲观主义色彩和乐观主义情绪的双重矛盾性。由此来看，库什纳以宗教历史观中末世论和审判日为参照来讨论20世纪末艾滋病危机下动荡的美国社会似乎再合适不过。学界对此问题尤为关注，克里斯托弗·比格斯博（Christopher Bigsby）认为库什纳深受本杰明历史概念的影响，而这部戏剧体现了库什纳对历史进步的理解，我们必须“不断回望历史的残垣断壁”（109）。詹姆士·米勒（James Miller）进一步指出，该剧无疑是历史大叙事（“国家历史”、“圣经历史”）和小叙事（类如“个人历史”、“医药历史”“种族历史”）的重合（67）。由于文本的现实主义指向，学者在关注库什纳历史观念的同时往往将其对于种族和性别身份的思考进行关联。例如，拉任·欧麦·谢尔曼（Ranen Omer-Sherman）讨论了《天使在美国》中犹太教、同性恋权益斗争和历史之间的联系。^⑥尽管有学者意识到了库什纳对圣经和历史史料的改写这一写作手法的深层次含义，^⑦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将此置于“非自然叙事”的学术背景下进行讨论，种种关于戏剧主题的讨论都忽略了非自然叙事对于戏剧主题的作用，而这一问题直接影响我们深入讨论库什纳对于伦理、情感和历史进步之间关系的理解。

戏剧的现实主义题材（同性恋、艾滋病、宗教和政治）和剧中的非自然叙事（天使和人的较量、鬼魂的拜访和普莱尔造访天堂等情节）错综交织，构成了复杂有趣的互动关系。超自然（supernatural）图景与人类世界的互动，显然并非当代美国历史和文学所热衷的主流话题。以往戏剧研究往往将超自然（supernatural）、魔幻（magical）或者异想（the fabulous / fantastic）等因素进行文化习俗化解读，或者同剧中人物的疯癫或精神紊乱联系在一起。显然，在后现代语境中，解释想象 / 幻觉（the fantastic）如何编织进入现实主义文本结构，以及如何和现实主义所倚靠的认知框架产生对话性似乎更为重要，而这也正是学术界公认讨论“非自然叙事”的意义所在。尽管学术界关于自然叙事和非自然叙事的界定存在分歧，^⑧但大致认为非自然叙事包括“人类逻辑和认知上的不可能场景，以及异想的、魔幻的和超自然的场景”（Fludernik 362）。笔者认为，讨论《天使在美国》中非自然叙事已经超越了对戏剧主题的讨论，而是借由认知模式来探索人物伦理身份的转变以及在这一过程产生的情感认知，通过对伦理情感的讨论，旨在解释库什纳对于伦理和历史进步的理解。

“非自然叙事”直指文本的虚构本质，因此和布莱希特提出的“间离效果”和后现代戏剧中“元戏剧”的自我指涉（self-reflexive）具有相通之处。然而从功能上来看，《天使在美国》中的非自然叙事无意间离观众的情感从而唤

醒观众的理性，也无意解构文学虚构性的本质，而是在自然叙事和非自然叙事的结合中，从认知的角度拓展伦理情感的可能性。剧中，深受艾滋病综合症折磨且被爱人抛弃的普莱尔不断被家族鬼魂拜访，死亡步步逼近，在这一过程中他看见了燃烧的圣经和破壁而降的巨大天使，最后来到了类似于卡夫卡笔下充满官僚主义的天堂。塞密·卢德威克（Sämi Ludwig）认为，对“不可能”的再现，为我们提供了特别的信息，即“经过处理的信息（‘意义’）而不是对于外部的模仿（模拟）（190）。与家族两代先灵的相遇，是一种物理上不可能出现的场景，可以说是面对未知情况失措无助时，摇摆在自我沉浸式情感和试图理解困境的尝试间的一种认知状态。从普莱尔所患疾病来看，艾滋病作为一种致命的毁灭性传染疾病，对于当时的大众而言无疑是极其可怕且不体面的（因为艾滋病患者常常是同性恋，因此对艾滋病早期的认识往往和不正常的性行为联系在一起）；从普莱尔的感情生活来看，同性者间的公开恋爱关系在当时并未得到美国社会的普遍理解和接受。因此，面对当时新的疾病和伦理关系（比如公开的同性恋关系）时，库什纳需要通过非自然叙事来拓展人类认知的限度，从而唤起人们的伦理情感。普莱尔对疾病的认识，正是建立在与鬼魂的沟通上。两个鬼魂分别来自十三世纪和十七世纪，死于英国历史上两次可怕的瘟疫；他们前来预警普莱尔死亡的恐惧和神秘信使的到来。普莱尔要鬼魂1解释他们的存在，他的回答模棱两可：“你活着，而我们已死。我们有同样的名字。你还希望我解释什么呢？”（*Millennium Approaches* 1682）。鬼魂2则告知普莱尔，他将被天使选中成为信使：“我怀疑，他们选择我们是因为血缘关系。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沃尔特家族中，总有一些深受瘟疫困扰”（*Millennium Approaches* 1683）。死亡的威胁把过去和现在、瘟疫和艾滋病、鬼魂对于痛苦和死亡的欣然接受以及普莱尔的苦苦挣扎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普莱尔与鬼魂的相遇，一方面让普莱尔重新认识了他所经受的生理疾病煎熬和（由于被爱人抛弃所遭受的）精神折磨，如同不断重复的历史，这不过是人类时刻面临疾病和死亡威胁的常态；另一方面，作为缺乏社会关怀且被忽略群体中的一员，选择普莱恩成为信使虽然并未解决普莱尔的伦理焦虑，但却暗示改变伦理身份进而重新理解历史和社会的可能性。库什纳曾说过，“我们为了自己重新建构世界，或者至少重新组织对它的理解”（*Thinking about* 39）。他指出重新解释甚至重写历史的重要性：因为通过对世界的思考，我们可期望发现生活的信仰和希望。

普莱尔正是在成为天使的使者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伦理选择。当他选择放弃永生、从天堂回到尘世时，他在改变历史的同时也从麻木和自怜自艾的情绪中走向了与现状和解、接受自我并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情感状态。这种伦理情感的转换最终通过伦理身份的转变实现。换句话说，渴望被救赎的个体成为了救赎他者的主体。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概念实际上是一个伦理概念”（25）。事实上，文学叙事便是关于如何理解人类生活以及人类生

活的指导。如果说普莱尔和鬼魂的相遇让普莱尔更加清醒地认识自我和疾病，普莱尔在天堂和天使的斗争则是出于主动伦理选择的伦理身份转换过程。戏剧重写了圣经中关于天使和预言的记载，这是库什纳做出的大胆尝试。阿尔伯在定义非自然叙事时，强调后现代文学可以理解为一种写作方式，“这种写作风格和非自然性叙事存在高度重合，不仅如此，它和传统文体中已经被世俗接受的不可能性再次产生联系”（13）。显然，对圣经的改写属于对于已经接受的“非自然叙事”的再次“非自然叙事”。对圣经大叙事的改写虽然属于逻辑上的不可能，即与真实世界的逻辑原则相违背，然而却是对于真实、身份和伦理的重新认知。根据天使的描述，1906年旧金山地震爆发后，上帝抛弃了人类离开了天堂，而“无能为力”的见证者天使们（*Perestroika* 130）希望通过禁止人类的一切活动，例如“人类的旅行、思想和想象力”，来“迫使上帝现身”（*Perestroika* 86）。天使选择普莱尔作为使者，承诺只要他放弃生命和进步去取《反移民书》，就能在天堂获得永生。只要普莱尔拿到《反移民书》，时钟就会倒转到静止的状态，历史不再进步，而人类的一切活动也将终结。尽管饱受疾病煎熬，可是普莱尔却拒绝了天使的请求，选择放弃永生、回到人类社会。

从认知角度来看，普莱尔“非自然”的伦理选择不仅实现了身份上的转换，而且实现了情感上的转换。普莱尔在这种逻辑上和物理上都不可能存在的情景中确立了对他者的完全责任感。他向天使们祈求，“我仍然想……获得祝福。尽管我病了，我还是想活下去”（*Perestroika* 131）。选择放弃在天堂的永生而回到人间活下去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活下去（more life）对于艾滋病患者普莱尔而言意味着生命，也意味着更多感染和患病的机会，以及无尽的痛苦。然而普莱尔明白：“我们不能停下来。我们不是石头——进步、移民、流动是……现代性。而现代性是生机勃勃的，这是生命的作为。[……] 我们不能等待。我们又能等待谁呢？上帝……”（*Perestroika* 130）。选择普莱尔为使者并非偶然，这和他的身份和处境密切相关。如同比格斯柏所说，“垂死、被抛弃的普莱尔象征被否认的真理和被忽略的对爱和关怀的需求”（109）。莫里卡·弗卢德理克（Monika Fluderik）认为，当读者阅读非自然叙事时，他们的解读方式不同于对摹拟叙事的解读方法，“他们更侧重于另一种世界的投射”（361）。正是在物理上不可能存在的天堂场景中，普莱尔完成了在现实世界里无法实现的身份和情感转变。通过非自然叙事，库什纳向我们展示了三种可能性。当普莱尔选择人类的进步而放弃在天堂的永生，从个体来看，他完成了从饱受疾病折磨的病患者到承担人类生命进步的救世者这一伦理身份的转变——在犹太文化中，先知和预言者承担着社会进步的使命。面对情感背叛和世人冷漠，普莱尔重新具备了爱和救赎他者的能力。而从更深层意义上来看，普莱尔的伦理选择不再局限于个人，确立对他者的责任，这也正是人类主体性（human agency）和人类身份的含义。面对苦难和历史，人不

再是历史的客体，而是历史的主体。普莱尔的痛苦根源——艾滋病——也成为了促使普莱尔完成伦理身份和伦理情感转变的必然条件，换句话说，艾滋病超越了社会耻辱的印记，成为了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力量。

按照阿尔贝对非自然叙事的分类，对罗伊·科恩和艾塞尔·卢森堡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改写属于物理上不可能出现的场景。对非自然叙事“自然化”解读的本质是，通过借助真实世界知识的认知框架来消除非自然叙事的非自然性（尚必武 13）。如果说普莱尔在关于天堂的非自然叙事中完成了从历史的客体到主体的身份转换，科恩则在物理上不可能存在的场景中和他者——“被迫害者艾塞尔”的鬼魂——建立责任和道德关系，实现了伦理关系的转化，从自我转化成为他者的“我”。换句话说，科恩从政治迫害者转换为被宽恕者，而鬼魂艾塞尔则在这一过程从被迫害者转变为宽恕者。历史上的科恩是纽约的一名律师，二战后的政治掮客。他的身份充满矛盾和虚伪。他是犹太人和同性恋，却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同性恋恐惧患者和反同性恋者。他是民主党人却为共和党谋事。他在 1986 年死于艾滋病，尽管至死都对外宣称肺病。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政府指控美国共产党员卢森堡夫妇为前苏联窃取核武器机密，将二人送上电椅，当时政府指派律师科恩为卢森堡夫妇罗织罪名（Fisher 61-62）。艾塞尔·卢森堡的案子非常具有争议性，五十年后事实真相依然被讨论，而科恩在案件中的作用也被重新调查。科恩在剧中被描述成一个亵渎上帝且毫无道德价值观念的人。他在和乔的谈话中滥用上帝的名字，还为自己迫害卢森堡夫妇的事实而自豪：“要不是我，艾塞尔·卢森堡到今天还活着，为一些妇女杂志写生活专栏”（*Millennium Approaches* 1689）。然而，库什纳从人性和伦理的角度塑造了戏剧中科恩和艾塞尔的形象，把科恩置于良心的谴责下，精神上饱受艾塞尔鬼魂的困扰，最后却得到了比利兹，路易和鬼魂艾塞尔的宽恕。詹姆士·弗希尔（James Fisher）认为库什纳塑造科恩这一人物的目的是为了“探索 20 世纪美国晚期美国未出柜的同性恋者的相关问题以及保守派政治的虚伪性”（62）。这种解释虽言之有理，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库什纳为何要设置科恩临死前和鬼魂相遇这种历史上并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发生的情景？笔者认为，这种非自然叙事有两层深意：从文本表层来看，正如艾塞尔的鬼魂来到科恩的病床边说到，“我来是看能否原谅你”（*Perestroika* 114），显然鬼魂的宽恕这种非自然情感的完成只能在非自然叙事中得以实现；而从文本和作者间的关系来看，这也是同性恋作家库什纳和历史人物科恩的和解方式。

科恩临死时的场景不仅完全背离历史事实，也脱离了逻辑上和认知上的可能。护士比利兹和路易本打算为普莱尔偷取 AZT——一种昂贵且稀有的治疗艾滋病的药。当他们看到垂死的科恩时，比利兹请求路易给科恩念犹太祷告词（Kaddish）。尽管起先路易生气地拒绝了，但他最终被说服，

开始祷告。鬼魂艾塞尔本来是来期待看到科恩死时的惨状，此时也加入了他们。比利兹，路易和艾塞尔为科恩所念的珈底什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珈底什是犹太教中唱给特定人具有救赎意义的赞美诗，也是一种通过赞美耶和华来荣耀死者的仪式。当这三人聚集在一起，用弗拉米基·明瓦拉（Framiji Minwalla）的话来说，“被处以死刑的共产党员（艾塞尔）、黑人同性恋者（比利兹）和有罪的犹太人（路易）哀悼科恩，宽恕科恩，自己也由此得到出路，从道德负担中解放出来”（110）。

这一幕不仅超越了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也超越了我们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当我们在虚构叙事作品中遇到上述“非自然情感”时，^⑨我们需要改变已有的心理预设，整合新的认知框架。显然，为临死的科恩念祷告的场景，探索的是一种秩序和意义的缺失以及和这种缺失和解过程中的种种困境。面对无法逃脱的未知情况，探讨非自然叙事的意义，在于能帮助我们理解自然情感和伦理情感之间的对立和转换以及伦理情感的多维度，从认知的角度重新定义传统价值体系中类如爱、责任和宽恕等道德价值。而在这一过程，需要重新定义的也包括人物的既定身份。正如比利兹的解释，“科恩是个可恶的家伙。但是他的死亡也很痛苦。所以也许……既然一个女王可以宽恕被她征服的敌人。这并不容易。如果容易也就不算什么了。宽恕是最难的。但它是爱和公正的联结点。至少通过宽恕我们能得到安宁”（*Perestroika* 124）。通过宽恕科恩，鬼魂艾塞尔完成了对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追寻，因为在科恩的病床边，她完成了伦理身份的转变——她不再是受迫害致死的受害者，而是具备拯救他者能力的宽恕者。鬼魂艾塞尔这样来解释她的存在：“我来看我是否能原谅你。”正是在非自然叙事中，她完成了对自我的认识，这种自我认识并不是内部参照的“自我”（ego），而是通过在不可能的场景中完成了和他者科恩的对话性依存关系的自我重新认知。从文学伦理学批评和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正是在非自然叙事中，鬼魂艾塞尔（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戏剧人物）成为了一个对他者（Other）负有责任感的自我（Self）。

正如前文所述，这种非自然叙事也是作家库什纳和科恩的和解方式，折射了他对于历史进步和伦理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库什纳有着复杂的情感。在一次采访中，他直言道，尽管他一直憎恨科恩，但当他读到新闻媒介对他的报道时依然心生悲伤，这是因为“尽管我们不愿意，然而他作为艾滋病的受害者这一事实让他成为同性恋群体中的一员”（Vorlicky 46）。从这种意义上讲，比利兹、路易和艾塞尔的祷告珈底什也意味库什纳对科恩的宽恕。在救赎科恩的过程中，宽恕的重要性和历史进步汇合到一起。当谈到宽恕和历史的关系时，库什纳认为，我们在现在的某个时刻能看到“一千个未来”，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一个充斥人类种种失败的社会中前进？在他看来，唯一的答案（出路）是宽恕：“你能原谅他人吗？这是我为什么要问关于宽恕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它可能还有

待于进一步理论化”（“Interview with Tony Kushner” 309）。显然，宽恕科恩的仪式可以被理解成为歌颂宽恕和爱的典礼。对历史的改写表明库什纳看到了“另一个美国，即可能从腐烂过去的血和粘液中重生的美国”（Bigsby 113）。库什纳对历史的本质和人类关系的思考深受布莱希特的影响。库什纳曾经说过，“在布莱希特关于历史主体和主体性的思考中，隐藏着一个问题，我们是历史的主体还是完全受它所控？我们创造历史还是历史改造我们？”

（“Interview with Tony Kushner” 303）。通过戏剧中不可能场景的设置，库什纳在探讨伦理身份和情感的问题时，最终指向的是伦理和历史的关系，从伦理的角度来重新解释历史。普莱尔和鬼魂艾塞尔在非自然叙事中伦理身份的转换和伦理情感的认知，使得他们从被历史控制和压抑的客体成为了主动改变历史轨迹的主体。

在《非自然叙事：小说与戏剧的不可能世界》（2016）一书中，阿尔贝说：“虚构叙事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它们不仅生产我们周围的经验世界，而且也经常包含一些在我们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实现的因素”（3）。在《天使在美国》中，“不可能实现的因素”构成了非自然叙事的主要内容。库什纳在剧中直面的现实问题是，艾滋病不仅撕裂了社会生活也重新挑战了人际关系和伦理价值。与其说库什纳表达了面对这一致命疾病时社会道德的沦陷，不如说他向我们展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精神状态。在这样的一个移民国家，人们正逐渐丧失一种保留历史感的能力，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断层直接引向对各种传统价值观的离弃，“适者生存”成为引导人们生活最重要原则。然而，正是“非自然叙事”使戏剧文本具有得以产生意义的话语空间，在现实和想象间建立一种对应且对比的联系。借助这种联系，库什纳探讨了历史进步的可能性和伦理关系的思考，深刻思索了伦理身份和情感的认知意义以及宽恕的救赎力量，在改革社会的强烈欲望和回归传统价值观念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Notes】

① 1993 年，第一部《千禧年降临》荣获普利策奖和四项舞台剧托尼奖，第二部《重建》在 1994 年荣获包括最佳戏剧和最佳男主角等三项托尼奖，而由 HBO 电视台制作改编的电视短剧在第 56 届美国电视艾美奖上更是荣获包括最佳系列短剧、最佳短剧类编剧、最佳短剧男 / 女主角在内的等七项奖项。

② 21 世纪以来，非自然叙事成为叙事学研究的新热点，重要论著包括理查森的《非自然声音：现当代小说的极端化叙述》（*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2006），阿尔贝和鲁狄格·海因策（Rüdiger Heinze）的《非自然叙事，非自然叙事学》（*Unnatural Narratives, Unnatural Narratology*, 2011），阿尔贝、尼尔森和理查森等人的《非自然叙事诗学》（*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2013），阿尔贝和佩尔·克罗格·汉森（Per Krogh Hansen）的《超越经典叙述：跨媒介与非自然的挑

战》（*Beyond Classical Narration: Transmedial and Unnatural Challenges*, 2014），理查森的《非自然叙事：理论、历史与实践》（*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2015）以及阿尔贝的《非自然叙事：小说与戏剧中的不可能世界》（*Unnatural Narrative: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 2016）。

③本文关于人物伦理身份的分析思路，主要受到聂珍钊教授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的启发。聂教授认为，“伦理身份是评价道德行为的前提。在现实中，伦理要求身份同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伦理身份与伦理规范相悖，于是导致伦理冲突，构成文学的文学性”（《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5）。

④聂珍钊教授在“论诗与情感”一文中，提出了自然情感和伦理情感的区别和转化。他以诗歌为例，说明“真正打动人心的是那些从自然情感转化而来的伦理情感”，这种情感“已经不是一种自然发生的自然意志，也不是任由情感泛滥的自由意志，而是经过理性的陶冶，自然情感转变成了理性的伦理情感”（54）。

⑤毕士达喷泉（Bethesda Fountain）位于纽约中央公园的核心。喷泉中的“水中天使”（The Angel of the Waters）雕像取自《约翰福音》第5章描述的一位天使，这位天使赋予了耶路撒冷的毕士达水池神奇的治愈疾病的功效。在天使的雕像下站有四个小天使，他们分别代表“节制”、“纯净”、“健康”与“和平”。

⑥ 详 见 “The Fate of the Other in Tony Kushner’s *Angels in America*,” *MELUS* 32.2 (2007): 7-30。

⑦例如，米勒指出，“通过在当代人物和历史人物之间建立一连串的类型关联，这部戏剧将艾滋病危机的恐慌和西方社会医学史上早起的毁灭性灾难联系在一起”(Miller 67)。而加纳(Garner Jr.)将对历史人物科恩的改写理解为“库什纳讲述反历史的一种方式”(Garner 180)。

⑧关于非自然叙事的多重定义及相关问题，可参考尚必武：“西方文论关键词：非自然叙事学”，《外国文学》2(2015): 95—111。

⑨关于文学叙事中的“非自然情感”的基本类型与表现样式，详见尚必武：“文学叙事中的非自然情感：基本类型与阐释选择”。

【Works Cited】

- Alber, John. *Unnatural Narrative: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2016.
- Bigby, Christopher. *Contemporary American Playw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9.
- Garner Jr., Stanton B.. “Angels in America. The Millennium and Postmodern Memory.” *Approaching the Millennium*. Ed. Deborah R. Geis & Steven F. Kruger. Michigan: The U of Michigan P, 1997. 173-84.
- Fludernik, Monika. “How Natural is ‘Unnatural Narratology’; or, What is Unnatural about Unnatural Narratology?”” *Narrative* 20. 3 (2012): 358-70.

- Fisher, James. *The Theatre of Tony Kushn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Kushner, Tony. *Angels in America: Millennium Approaches. The Bedford Introduction of Drama*. Ed. Lee A. Jacobus. 4th ed. Boston, New York: Bedford/ St. Marin's, 2001.
- . *Angels in America: Perestroika*.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Inc, 1994.
- . *Thinking About the Longstanding Problems of Virtue and Happiness*. 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1995.
- Ludwig, Sämi. "Grotesque Landscapes: African American Fiction, Voodoo Animism, and Cognitive Models." *Mapping African America: History, Narrative Form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Ed. Maria Diedrich, Carl Pedersen, & Justine Tally. Hamburg: lit, 1999. 189– 202.
- Miller, James. "Heaven Quake: Queer Anagogies in Kushner's America." *Approaching the Millennium*. Ed. Deborah R. Geis & Steven F. Kruge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56-57.
- Minwalla, Framiji. "When Girls Collide: Considering Race in *Angels in America*." *Approaching the Millennium*. Ed. Deborah R. Geis & Steven F. Kruge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 Savran, David. Interview with Tony Kushner. *Speaking on Stage: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America Playwrights*. Ed. Philip C. Kolin and Colby H. Kullman. Tuscaloosa: AL, 1996.
- Zunshine, Lisa. *Strange Concepts and the Stories They Make Possibl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2008.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论诗与情感”，《山东社会科学》8 (2014): 51-58。
- [---. "Poetry and Emotion."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8 (2014): 51-58.]
- 尚必武：“文学叙事中的非自然情感：基本类型与阐释选择”，《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2016): 5-16。
- [Shang Biwu. "Unnatural Emotions in Literary Narrative: Basic Categories and Interpretive Options."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4 (2016): 5-16.]

责任编辑：尚必武